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 空间、媒介和 上海叙事



蔡翔 董丽敏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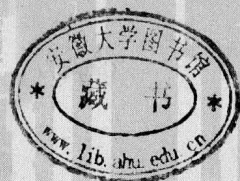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忻平

# 空间、媒介和 上海叙事



蔡翔 董丽敏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蔡翔,董丽敏等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4

(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忻平主编)

ISBN 978-7-5671-0147-0

I. ①空… II. ①蔡… ②董…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上海市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619 号

责任编辑:焦贵平 管志华

封面设计:张天志

版式设计:施羲雯

技术编辑:金鑫 章斐

### 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

蔡翔 董丽敏 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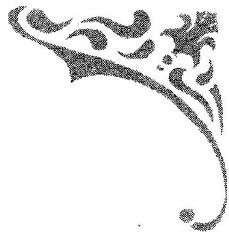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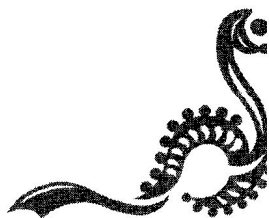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47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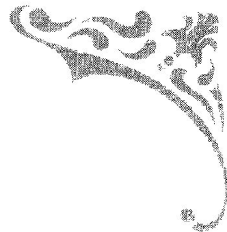
ISBN 978-7-5671-0147-0/I·157 定价:6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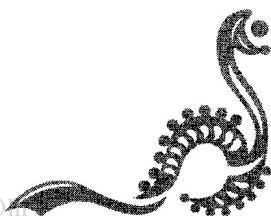
本研究受上海大学“211工程”  
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  
(A.15 - A011 - 09 - 001) 资助，谨致感谢！







本书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第三期）  
“中国现当代文学”（S30101）的资助，  
谨致感谢！



# 总序

忻平

## 一

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是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课题的部分成果。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生态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及海外中国研究专家共同关心的领域,它吸引了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研究多集中在精英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讨论上,近年来对民间文化生态研究也已开始多起来。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及全球化的深入,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国家/社会、主流/边缘等多种文化资源与价值取向交融竞争,使民间文化生态更趋复杂,也引发以“信仰/价值的缺失与重构”为核心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要求研究视野更多地从上层转向下层,从官方转向民间。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变化趋势之一。民间社会的文化资源需要重新整理与总结,其社会转型中引发出的问题,也必须在充分研究的前提下谋求解决之道。

以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开始了漫长的社会转型。不仅史学界以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研究对象,人文社科各学科也以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为重大问题。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已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有更确切的含义,包含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威权政治向民主社会等社会经济全面的转型。

由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当代社会转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如



今中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不应回避的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学者作出了“社会溃败”的悲观判断。中国发展的模式无疑是成功的,发展走向也是合理的。然腐败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也已充分暴露。可以说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时期。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努力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文化自身的状况及其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实际事关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它诞生初期主要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其后开始关注文化内部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联,并认为这种关联性影响和制约着文化整体的发展。因此文化生态被视为各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系统。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化生态不容乐观,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不断地吞噬着地方的传统文化,威胁到文化的多样性。无孔不入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导致文化受到污染。通俗文化的强势和精英文化的缺失使得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功利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匮乏,只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从而造成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价值扭曲、信仰失落等一系列负面后果。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必须修复文化生态的平衡。这既要靠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又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实现全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的文化自觉,从而达到文化生态的和谐。

人文基础学科有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本项目从城乡社会生活、文化生产、信仰与价值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研究“转型

期中国民间的文化生态”，通过科学地认识转型期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间文化生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知识基础、话语体系和决策参考。

城乡生活是民间文化生态的基础，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关心的前沿问题。本领域的研究结合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发展演变。但已有的相关成果多集中在古代及大城市研究上，对近代转型期的城乡社会生活的比较及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生态的互动关注明显不够。这与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城乡社会生活变迁引发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态急剧变革的现实是不对称的。有鉴于此，我们将“近现代城乡生活与文化生态”列为本项目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以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如何改造与重建城乡文化生态为出发点，研究城乡生活与中西文化、乡土文化与民间精神、方言与地域文化，通过研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代谢，揭示其中传统与现代因素、本土与外来因素的衔接、冲突与竞争，试图找出影响构建适应经济基础的文化生态中的核心问题与应对之策。

对中国民间文化生态得以生成、运行与传播的文化生产机制的分析，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对文化生产问题的关注首先来自马克思。国外学者韦伯、阿多诺、鲍德里亚等纷纷从现代性、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等多种维度展开了对文化及其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国内有关文化生产机制的提法最早由王晓明教授提出，将生产机制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文化领域，探讨中国当代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及其历史条件和资源，将有力地推动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因此我们将“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及国家策略”列为本项目的另一个方向。该方向关注当代日常生活文化、文化传播机制、文化观念/意识、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分析和现代早期的思想与文化等内容，研究正在形成的文化状况及其生产机制以及是否能有效地参与新的文化现实的构建。

信仰多样性及其认同是民间社会文化生态合理构建的核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渗透与竞争产生了民间的信仰多样性的局面，使得信仰及其认同的探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日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分析民间文化生态中信仰多样性的现状及原因，将有助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寻

求和建设民间社会共同价值认同和国家对信仰问题的有效治理与引导。因此我们将“信仰多样性的民间认同与政府管理”作为本项目的第三个方向。该方向从宗教信仰与民间社会认同、当代宗教与社会转型、知识及价值与主流信仰等问题研究入手,探讨转型期社会信仰多样性及民间社会基本价值认同的状况及变化,为和谐社会下民间信仰体系建设提供知识和决策参考。

## 二

自近代以来,上海在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海内外学者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学界对它的重视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上海学”的概念,用以强化上海研究的学术和学科意义。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地方高校,早在80年代便向本科生开设了“上海学”课程。本项目课题团队依托上海大学的这一传统优势,将上海作为一个研究重点,经过文史哲三个学科的协同努力,得以出版这套“转型期中国(上海)文化生态研究丛书”。概言之,本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其时间脉络的完整性。本丛书的关注点从上海文明的古老源头一路延伸到当代。张童心近年对上海及其周边的考古研究,揭示了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他参与主持的广富林遗址最新考古发掘,将上海地区的人类文明史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崔志伟的《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对元明之际松江文人群体的来源、交游、政权更替下的文人心态、文人创作题材与形式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刘蕾从归有光与嘉定文坛关系入手,展示了归有光在嘉定文坛地位的确立及思想的传承过程,探究了明清之际归有光文坛地位发生转变的原因。忻平的《危机与应对:1929—1933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研究》一书把视线拉到近代。通过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下上海市民各阶层群体和组织、不同领域和生活方式的多维考察,展现了危机时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及民间应对方式。王光东等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上海写作》一书,以张资平、茅盾、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作品为个案,讨论了中国现代作家对上海的想象方式以及产生的原因,阐明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及其内在关系。王晓明的《今日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九十年代以来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则进一步将目光

定格在当下的主流文化的生产机制,考察它与都市青年日常生活的关联。

第二是关注民间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的日常性。陶飞亚的《中西文化交流与上海世俗生活》便从历史的移动中展现基督教宗教东来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这样一个见微知著的历史命题。王晓明对当前文化生产机制的考察,也是从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角度切入。忻平主编的《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更是展现了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诸多面相。

第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学科交叉性。多学科意味着多种学术探讨的方法,本套丛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仅涵盖了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学科视角,更对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了广泛借鉴。如蔡翔和董丽敏等著的《空间、媒介和上海叙事》一书,就是运用了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从空间和媒介两个视角,考察上海文学叙事过程文化观念形成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和文化关系的重构,分析由此形成的上海符号和符号体系。

第四是研究方法的直接针对性。本丛书以上海为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对上海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新的探索。曾军等著的《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集中反映了这一关怀和努力。此书意在以上海为方法,去充分展示“中国模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深刻揭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同时通过反思性、批判性的维度,来探索一种上海作为综合研究对象的可能性。本书构思宏大,内容丰富,囊括了上海与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上海与中国城市精神建构、上海与中国城市建筑美学、上海与中国城市改造运动、上海与中国城市文化记忆、上海与中国文化制度变迁以及上海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等重要问题。

第五是学术关怀的当代性,即注重当代上海的最新变化及发展趋势。吕建昌的《上海世博会与未来上海发展》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从文博事业的角度审视历史上世博会与博物馆发展的关系,进而扩展到世博会对城市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影响,博物馆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世博后上海城市未来的发展走向等问题。本书提出了上海世博会后续“文化效应”的概念,为全面、客观评估世博会对举办地所产生的总体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雷洪波的《移民视角下的上海城市语言接触》是对当前上海正在发生的语言接触所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旨在通过描述当前城市背景下移民的语言选择模式、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语言态度等相关问题,从语言接触中的另一方——移民的角度出发,反映语



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现实。王天恩的《历史逻辑与主流信仰——以上海市情为背景》从哲学的层面对当前上海的主流信仰进行了剖析,无疑也体现了本团队强烈的现实关怀。

丛书的作者,既有资深学者,又有青年新锐。丛书得以付梓出版,是多年来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作为丛书的主编,我衷心感谢大家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很高兴承担这个编辑工作,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推介给广大读者。由于时间仓促,丛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存在种种不足,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 导论 再生与毁灭之地<sup>①</sup>

——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空间里弥散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亨利·列斐伏尔

—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1917)中曾经感叹道：“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江浙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租界一隅，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昔《洛阳名园记序》称天下盛衰视洛阳，洛阳之盛衰视名园之兴废，吾于上海则亦曰：天下之治乱视上海，上海之治乱视租界，盖世变系焉。”<sup>②</sup>他的感叹虽然不脱“治乱、盛衰、兴废”的老套，却也相当显豁地把上海“繁荣”的历史带入到绵延不绝的“暴力”语境之中。更重要的是，构成这一语境的不仅是一场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兵事”，而且在这个语境中，与频繁“兵事”相呼应的，那种让姚公鹤感叹不已的，似乎有悖常理的海发展“规律”，其实和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密切相关。

很显然，所谓“日益全球化的暴力系统”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

---

①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多位上海市研究专家的著述，如熊月之先生、李天纲先生、郑祖安先生和卢汉超先生等，不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章的观点都由著者负责。

② 姚公鹤：《上海闲话》，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义作为两者的结合形态以暴力形式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形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历史不再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时间过程,而是彼此交织成一个共同的空间场域。正如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首先是一种不同历史互为依存,不同领域相互交叠的现象,其次是一种要求作出思想和政治选择的现象。例如,如果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或越南的历史,加勒比海、非洲或印度和英国历史分开来研究而不是摆在一起看,那么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就会被人为地、错误地拆开。”<sup>①</sup>同样,离开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就无法理解上海开埠以后的历史,特别是隐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支配和被支配的经验”。而安东尼·金则更进一步指出,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历史与现状的讨论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常常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实际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1500年~1950年之间都被欧洲列强所殖民,这些殖民城市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获得独立。因此他建议,如果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些城市的状况,就必须把这些城市的“殖民城市”阶段和“全球或世界城市”阶段联系起来考察与研究。<sup>②</sup>但是,在目前颇为流行的历史叙述中,上海的“殖民经验”还是被有意无意地改写、涂抹、忽略甚至遗忘。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近些年来“张爱玲热”与“上海热”互为表里,相互生产,可是却少有人论及张爱玲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殖民经验。即使有论者提到张爱玲与殖民城市的关系,也没有仔细区分张爱玲是如何利用上海和香港作为不同的殖民地类型,在作品中建构起互相“张看”的视点,更无法顾及从“租界”到“沦陷区”,上海殖民管治方式的变化又会怎样激发起张爱玲以“文学”穿透“历史”的想象力。从一个更大的方面来看,渐成显学的“张爱玲研究”对“殖民经验”的“盲视”,只不过是当今历史叙述中“殖民主义健忘症”的一个小小的表征罢了!

当然,在这里重新强调上海历史和“殖民主义”的内在关联,并非把“殖民主义”视为一个空洞化、同质性的术语,试图以此来锁闭历史的叙述。一方面,上海在开埠之前已经成为了“海外百货俱集”的“东南都会”了,它之所以在“五口通商”之后

<sup>①</sup> 参见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导论”部分的相关论述,蔡源林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sup>②</sup> 参见Anthony King,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economy: Cultural and Spat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Urban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90.

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来业已形成的经济、贸易和交通网络的支持。把上海发展的历史神话般描述为从“江滨小渔村”如何一跃而成为“国际大都市”,不仅在微观的层次上重弹“冲击——回应”的老调,强化了中国“没有历史”,迫切需要充满活力的西方“拯救”的想象,而且还隐含着另一层险恶的意识形态效果:借“发展主义”的神话将“殖民主义”匿名化、合法化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过程的殖民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整齐统一的规划,它并没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往往根据不同殖民地的特殊情形生产出新的管治方法、手段和技术,甚至派生出似乎与传统殖民地颇有出入的新统治模式,充分地显示出了殖民治理权力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譬如,研究 19 世纪殖民主义的历史一般都把眼光集中在非洲、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区,对南北美洲却往往视而不见,因为在美洲拉开 19 世纪序幕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独立运动,即早在 16 世纪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帝国”的解体。然而,继续深究这一蔓延美洲的独立运动,不难发现潜藏其后的是一种“非领土性”的“殖民主义”新形式,它的动力来自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新战略。西班牙属美洲国家的最终得以独立,依靠的是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关键时刻的支持。这些国家的“独立”恰好意味着为英、法帝国主义的资本、商品和技术在美洲找到了市场、原料和金融伙伴。于是,从殖民扩张的全球战略来看,帝国主义既在非洲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同时又在美洲竭力促成独立运动,两种殖民方式都完满地服务于帝国主义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张的根本利益。

## 二

基于一种对“殖民主义”较为复杂的理解,上海的“殖民经验”不能像过去那样用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之类的词语轻易打发掉。相反,应该充分注意到“殖民主义”是如何在上海“在地化”的,也即“租界”——上海所谓“租界”其实指的是“居留地”。它的英文表述为“settlement”,从其动词 settle(安顿、居留之意)而来,因此,这个词更准确的中文表述应该是“居留地”,意为该地区内允许外侨私人租地居留,租地的手续是由各地侨商直接向中国当地的原业主商租。它与“租界”(concession)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中国政府将一个地区内所有的土地整个租给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将该地段分租给该国侨商,例如汉口、天津

的租界。<sup>①</sup>虽然习惯上还是把两者统一称为“租界”，但租地方式的差异并非不重要，上海殖民地在空间扩张上之所以比汉口、天津来得便捷、容易和迅猛，与此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殖民地”形式，是如何“镶嵌”进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继而采用何种策略规划、改造和重建了原有的社会脉络？同时，原有社会又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排拒和抵抗这种殖民改造的？具体而言，“租界”对土地的直接诉求，凸显了殖民主义侵略性的特质——对空间的掠夺、占有和改造。因此，“租界”和原有社会之间的冲突和重组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空间面向的争夺上。

但以往人们常常是在诸如“现代”与“传统”碰撞之类的“时间”框架内解释这种“空间”冲突，进而赋予“现代”以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将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的论述，不仅正当化了透过缺乏空间感的直线进化论来观察世界的做法，而且运用“以时间消灭空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by time)的策略进一步抹去了原有社会的主体性，强调“殖民主义”即使作为一种“恶”的力量，也具有将“传统”带入“现代”的莫大功劳。例如，在描述上海进入“现代”的状况时，很多研究者都愿意引用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一段经典论述：“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sup>②</sup>并且以这一经典论述为出发点，在不同的历史叙述框架中——如“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把“上海”理解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或“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关节点”。在具体的历史论述中，两种史观或许时有冲突，但就最终的结论而言，它们都认定由于“上海”的出现，中国似乎摆脱了“没有历史”的状态而进入到“世界历史”之中。

<sup>①</sup> 根据当时的国际法，“租界”(Concession)指订立永远租约，将整个地段租与一租赁国；再由该国转而分租给侨民居住，该国向中国政府纳总税，而外侨又向领事署纳税。地契由该国领事发给并登记。界内也由该国管理，常以该国领事为该地行政长官；“居留地”(Settlement)则为双方订约，规定在通商口岸划定界限，在该界限内允许订约国侨民租地居住。外侨租地是直接向华人原业主商议，商议成功以后，可以请求中国地方官发给契据。外侨直接向中国政府纳税，而非向外国领事馆纳税。参见《上海法租界之设定及其反响》，载陈三井：《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3~27页，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

<sup>②</sup>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尽管马克思在道义上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但他把中国比喻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而把帝国的入侵想象成“新鲜空气”,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欧洲“现代化”论者。而正是出于对“现代化”(“革命”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种形态)的迷信,使得“时间”取代了“空间”成为现代历史叙述中毋庸置疑的前提。不过,近年来这一前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约翰尼斯·费边在《时间与非我》一书中,就从“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的角度对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进化论式的构想上,这种对时间的构想把“非我”(也即“非西方”)事先放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也即“西方”)这一端文明之优越。这就是所谓“时间的空间化”,把那些距离“西方”(“我类”)较为遥远的“非西方”(非我)社会,认定为在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上都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它们需要欧洲文明的帮助,才有可能进步到更为“现代”的阶段。正如费边所言,“在西方思想中,‘原始’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体现在现代民族志中,即“西方”人类学家习惯性地吧“非西方”对象排斥在现时的历史时刻之外。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脱节,使得“非西方”的现实只有在被看作是“西方”的过去,才能获得理解的可能和存在的意义。<sup>①</sup>

用“时间的空间化”来否认“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空间的“共时性”联系,不仅正面阻止了西方人类学对其自身学术政治和知识历史的质疑,而且相当巧妙地在社会理论的层面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由“空间的掠夺”转化为“时间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合法化了“西方”对“非西方”的殖民侵略。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讨论“现代殖民理论”时就指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作为“资本的献媚者”在宗主国有意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说成是同一的”,而在殖民地,他则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资本的利益,“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sup>②</sup>一旦殖民地的前资本

<sup>①</sup> 参见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时间与非我: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一书中的相关论述。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主义生产方式被解释为原始的、落后的和不能独立发展的,并与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的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它就必须通过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劳动、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从功能上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而殖民地的“发展”就被定义为一个消灭和改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过程。譬如,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的历史意义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被这样的“发展”所定位的,正如斯皮瓦克指出的:“印度卷入到殖民主义中来,这通常被界定为从半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奴役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按照生产方式的宏伟叙事来定义的,而且通过令人不安的暗示,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一叙事中定义的。与此同时,这一变化还被视为被殖民者获得政治意义的开端。殖民主体是从一批本土精英那里浮现出来的,他们通常被松散地描述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sup>①</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则着眼于资本主义如何在殖民地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条件,他虽然把殖民主义当作一种必要的“罪恶”,认为它野蛮却有效地把“非西方”带入到由西方规划的“现代”历史过程之中,但对政治经济学家“向资本献媚”的批评,也显示出马克思对西方理论生产与殖民扩张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把握,从而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描绘出“资本主义”强烈的“空间”欲望,“一方面资本必须竭力打破每个空间障碍去交往,也就是说去交换,为开拓市场而征服全球;同时另一方面,资本又必须努力消除这个带时间性的空间,也就是说要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耗费的运动时间最小化……这就出现了资本的世界性倾向,这使之与以前任何时期的生产区别开来。”<sup>②</sup>

### 三

在批判殖民主义的视野中强调“资本”的“空间”面向,不仅质疑了建立在单一

<sup>①</sup> G. P. Spivak, *In Other World: Essay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197.

<sup>②</sup> K.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539 - 540, Trans. M. Nicola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也可参见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一文中的有关论述,特别是第二节“空间与时间的历史地理学的唯物论观点”和第三节“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与时间的历史地理学”,王志弘译,载《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包亚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